

经济下行压力不减 政策可适度宽松 加快创新驱动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 2014 年秋季论坛上周六在北京举行。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认为,2015 年宏观经济的整体形势要比 2014 年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国际环境复杂化、经济增长周期性下行和结构转型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潘建成：成本压力倒逼企业加大创新

问卷调查显示,企业今年研发投入“增加”的企业经营者占 57.2%,这一结果比 2013 年上升了 24.8 个百分点。这与企业感受到的沉重的成本压力密切相关。在“三期叠加”的倒逼机制影响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力度在明显加大。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出席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 2014 年秋季论坛”时指出,在传统的投资动力趋弱,同时没有出台大规模扩张性的经济刺激政策的背景下,正是由于在增长换挡中逐步实现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中国经济才实现了平稳增长。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转换,结构分化与增长动力转换密切相关。”潘建成指出,从投资、消费的贡献看,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8.5%,不仅比去年同期高 2.6 个百分点,而且比投资的贡献高 7 个百分点,去年同期则是投资的贡献比消费的贡献高近 10 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表现在哪些方面?潘建成指出,首先是投资内部的分化十分明显,1-10 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9%,制造业投资增长下滑至 13.5%,其中钢铁投资呈现负增长。若剔除房地产投资的较大幅度回落,第三产业投资增长保持了 20%左右的增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增长高达 35%。这是一种从资源密集型投资向技术密集型投资转变的过程,体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增强。

微观层面的信息也显示,企业的创新动力在增强。据潘建成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2014 年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调查企业今年研发投入“增加”的企业经营者占 57.2%,这一结果比 2013 年上升了 24.8 个百分点。这与企业感受到的沉重的成本压力密切相关。在“三期叠加”的倒逼机制影响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力度在明显加大,微观上推动的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正在增强。

此外,企业创新动力增强推动了信息化的发展,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结果,2014 年 IT 设备制造业订货处于正常水平或好于正常水平的企业比重达 79.2%,分别比 2013 年和 2012 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和 37.3 个百分点。在当前大多数行业价格疲弱的背景下,企业家同时预期 2015 年 IT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价格趋于上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对结构升级的预期。

在潘建成看来,随着今年以来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出台,以及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支撑,未来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还是可以预期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期叠加的影响是长期的,房地产形势的变化总体来说也是趋势性的,因而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下行压力短期难以消失。”潘建成强调,在这个时候,对经济增长下行既要有警惕,也要保持淡定。事实上,经济增长下滑本身并不可怕,需要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会否影响到就业,是否会影响老百姓的收入稳定。

专家表示,以往改革有成形的改革路径可资借鉴,一般都能给现行改革提供思路、经验和教训,但现在提出的是联动改革,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参照系。专家建议,明年仍然可以继续利用降息、降低存准率、财税改革等政策工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马晓河：明年财政适度宽松可继续降息降准

明年政策的三点建议:第一,财政适度宽松,加大支出规模,加快支出速度,适当向有利于消费的方向倾斜;第二,货币政策方面,明年可以继续降息,在美元回流的情况下,可以在适当时点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给;第三,加快落实改革措施,把能促进结构调整、建立消费型和橄榄型社会方面的改革放在重要地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参加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 2014 年秋季论坛”时表示,明年中国经济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比如国际环境复杂化、经济增长周期性下行等,对此宏观调控政策要积极应对,在适当放松货币政策同时,还要加大推进改革的力度。

马晓河说,明年国际市场对中国有利有弊,美国和印度经济向好,欧洲、日本和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大,美元回流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增加了明年世界经济通缩的可能性,近期对中国有利,远期不利。

他认为,国内的有利因素包括四方面:一是改革步伐加快有助于释放增长潜力,包括下放审批权、金融改革、减税降费、国企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将会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二是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可以挖掘增长潜力,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解决三个 1 亿人口的问题,打造长江经济带,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极,会带来巨量投资和消费;三是积极走出去的各种安排带来增长动力,未来十年对外计划投资 1.25 万亿美元;四是实施微刺激(定向宽松)强度在加大,下半年宽松措施陆续出台。

从国内看,有四大因素对增长构成压力,包括经济出现周期性下行、私人消费增长缓慢、落后产能淘汰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和房地产未出现抬头倾向等。

对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马晓河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财政适度宽松,加大支出规模,加快支出速度,适当向有利于消费的方向倾斜,大幅度提高基本医疗、养老补助标准和贫困救助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第二,货币政策方面,明年可以继续降息,在美元回流的情况下,可以在适当时点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给;第三,加快落实改革措施,把能促进结构调整、建立消费型和橄榄型社会方面的改革放在重要地位。



高培勇：政策目标日益多元 联动改革难度增大

以往改革有成形的改革路径可资借鉴,一般都能给现行改革提供思路、经验和教训,但现在提出的是联动改革,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参照系。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需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事权与支出相匹配的制度。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是防控地方债风险和健全地方财政体系,如果这里慢半拍,其他方面的改革只能是权宜之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参加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 2014 年秋季论坛”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亮点之一是把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并且把它作为改革突破口。

高培勇指出,2015 年宏观经济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整体形势要比 2014 年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多元。2008 年的时候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增长,到 2010 年的时候,在增长之外增加了物价问题,2012 年又把防风险的问题加了进来。而目前,宏观经济目标已经归结为七项: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

若把 2008 年的单一目标比作打歼灭战的话,现在的经济形势实际上是阵地战,阵地战就意味着每个山头都得守,需要把有限的宏观经济资源同时配备到七个阵地上去,难免出现左右摇摆的情况,或者说是拉锯战,这将是 2015 年可能会出现格局。”高培勇强调。

他指出,以往的改革有成形的改革路径可资借鉴,比如过去 35 年经济发展的路径如何,经济体制改革运行出现了哪些要素,一般都能给现行改革提供思路、经验和教训,但现在提出的是联动改革,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参照系,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过去一年多来,能够总体系统阐述的只有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其他领域的改革方案仍在局部运作。

具体到财税改革,高培勇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亮点之一就是把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并且把它作为改革突破口。目前财税方面的改革包括了税制改革、预算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相对而言,税制改革最为翔实,有目标,有重点,有具体方案和推进路径,主线就是大幅度降低间接税的同时适当增加一些直接税,房产税是直接税的一个选项。

其次是预算改革,这是整个财税改革的突破口,目标是“全面规范,公开透明”,它先行的标志是 8 月底公布的预算法,但新预算法有一个大的遗憾。他强调,政府的收支包括一般公务预算、政府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法律规定,所有的政府收支都应该公开透明,但涉及政府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时,就不够规范透明。

再次就是财政体制改革,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需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事权与支出相匹配的制度。高培勇指出,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是防控地方债风险和健全地方财政体系,如果这里慢半拍,其他方面的改革只能是权宜之计。



林义相：避免把“混改”改成“浑改”

改革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不偷也是贼”的嫌疑。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提高混改过程的透明度,这就要把混改当事人特别是决策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更具体的当事人的联络方式公开。千万要避免把“混改”改成“浑改”,要避免搞得浑浊不清,这特别重要。

在近日召开的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 2014 年秋季论坛”上,天相投顾董事长林义相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避免把“混改”改成“浑改”。

林义相指出,首先,混合所有制并非新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赋予新内容、能否改出新意。

其次,如果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参与各方一定都是想从中获取利益,因此,混改一定要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如果不能创造新价值,这个过程就会变成现有利益重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要创造价值,其价值来源不在交易过程,而应当在形成混合所有制以后,应该在制度创新上创造新的价值,而制度创新实际上是要解决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

林义相表示,从现代企业治理来看,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都面临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国有企业有它独特的治理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因素更宽泛,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复杂,涉及的人员和机构更多,因而形成的委托代理链条非常多,且相互交叉。所以,在这种国有企业代理关系中,任何环节只要有一个地方损害委托人利益,整个国有企业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最后委托人利益就会受到阻碍。

林义相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公司管理层有两重身份,一方面可能有一定的产权在里面,利益是靠利润实现,另一方面又是拿工资的,这些混合在一起。但古典经济学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中,一部分跟利润挂钩,另一部分跟工资挂钩,就必然会出现扩张性行为,从而导致企业出现扩张性通货膨胀。这种企业最后决定的产量要大于在自由竞争状态下的企业的最大产量,同时成本要高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企业成本。这就使这些企业平时是微利或者亏损,不可能维持下去,因而必须通过提价来维持经营,一旦提价以后又会进行扩张,一扩张成本又上去了,利润又下去了,就又提价,这样就会存在亏损-涨价-扩张-再亏损-再涨价-再扩张的循环,即“扩张性通货膨胀”,这样下去企业就会被淘汰。

林义相还指出,因为混合所有制会涉及相当大的利益,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种“不偷也是贼”的嫌疑。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提高混改过程的透明度,这就要把混改当事人特别是决策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更具体的当事人的联络方式公开。而在信息透明公开的同时,还要保障老百姓的优先参与。这是到目前为止,避免“不偷也是贼”的最有效方式。

林义相最后强调,千万要避免把“混改”改成“浑改”,要避免搞得浑浊不清,这特别重要。

